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民主的都更，多元的城市

Building a Multi-Cultural City through Democratic Urban Renewal

doi:10.6752/JCS.201209\_(15).0013

文化研究, (15), 2012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5), 2012

作者/Author：李丁讚(Ding-Tzann Lii)

頁數/Page：248-270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12/09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209\\_\(15\).0013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209_(15).0013)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民主的都更，多元的城市

### Building A Multi-Cultural City through Democratic Urban Renewal

李丁讚

Ding-Tzann Lii

#### 一、把「社造」帶入「都更」

1990年代末期，台灣都市住宅政策出現了兩項重大轉變，其一是停止興建國宅，其二是開放私人資本加入都市更新。這兩項政策共同宣告，政府正式放棄對都市住宅的責任，改由市場的機能來主導、甚至取代。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正向台灣社會的每個領域、每個向度、每個層面侵蝕。

但問題是，根據《都市更新條例》第一條規定，都市更新的目的是：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，復甦都市機能，改善住宅環境，增進公共利益。我們要問，由私人資本所主導的都市更新，可以復甦都市機能嗎？也許可以，但要看看是怎樣的都市機能。工業與商業等機能應該沒問題，但是，文化、歷史、生態等類型的機能，資本家可能就沒有什麼興趣了。當然更不要說「公共利益」了。

以「文林苑」的都更案為例，把幾家低矮的建築，或是透天厝拆掉，改建成流線型的摩天大樓，整個建築基地幾乎沒有改變，沒有創造任何新的公共空間，新建成的大樓，基本上就變成一個商業，或是住商混和的大樓，這跟「公共利益」有什麼相關？漢寶德就認為，這是「建築更新」，而不是「都市更新」。（漢寶德 2012/05/27）也正因為這只是「建築更新」，沒有創造任何明顯的「公共利益」，所以，屋主沒有任何義務要配合。任何建築更新，都必須獲得所有住戶的同意與配合。

airiti

因此，所有任何稱得上都市更新的案例，都必須有明顯的公共利益才算。否則頂多只是建築更新而已，由住戶與建商自己解決就可以了，不必勞駕公家機關的介入。但是，台灣目前的都更，其實都是建商在主導，政府與民衆只是間接配合而已，才讓都更變成純然的市場運作，只有赤裸裸的商業邏輯，不見公共利益，但公權力卻又有權利要求少數不同意者犧牲配合。這是目前都更的弔詭與不合理處。而且，也因為純粹是商業邏輯的運作，都更的內容與方向都很雷同，基本上就是把低矮醜舊的房子拆掉，換成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，以至於讓城市機能越來越同質、單元，最後甚至失去活力與方便，與公共利益背道而馳。本文認為，這是當前都更最主要的問題。

但是，如何恢復都更的公共面向呢？由私人資本主導的都更如果無法創造公共利益，那麼，是什麼樣的行動者，或是行動群體才有能力創造公共利益呢？這個群體又要透過怎樣的行動來確保公共性呢？本文認為，都更的範圍本來就不是一棟大樓，而應包含至少一個街廓(block)，甚至包括數個街廓在內的整個「鄰里」(neighborhood)，而都更的行動者，當然就是這個範圍內的所有居民。更具體地說，居民透過「社造」的民主過程，凝聚共識，提出構想，最後才由官方、資本和專家協助完成。

因此，都更最重要的內涵，其實不是硬體的改變，而是軟體的建構，也就是居民凝聚共識的過程。缺少這部分，都更只是建築或景觀設計，對居民的改變不大。但是，透過社造的過程，居民開始互動、發揮想像，連結想像，各種可能性都有可能被創造出來。政府介入的意義，就是鼓勵有特色，尤其具有永續、文化、或歷史價值的構想，所有的公共資源就要花在這些有價值的規劃案，進而促成城市的轉型。都更不是要替城市化妝，而是要建構城市的精神內涵。筆者認為，一個沒有精神內涵，居民沒有建立共識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特色與方向的社區，根本不應該進行都更。

1990年代末期，是社區總體營造的鼎盛期，可是，都更的私有化與市場化，卻也在這個時候發生。為什麼社造沒有嘗試要介入都更呢？讓人不解。但以台灣社造所累積的基礎，包括知識、技術、人才

等，把都更重新納入社造的內涵與範疇，應該是有實踐的可能性的。筆者認為，從社造出發的都更，才有可能召喚並落實都市的「公共利益」。由官方和資本主導的都更，都不可能。

爲什麼連官方主導的都更無法創造公共利益呢？比起資本所主導的都更，官方的版本也許會多一些公共空間、綠地、也有可能保留更多的歷史建築。但是，只要「由上而下」的邏輯不變，其與由資本所主導的都更，差異不大，最後都會變成一種類似都市規劃的翻版，街道越來越寬、越大、越直，大樓越來越高、越新、越光亮，所有矮的、低地、暗的、彎的、小的、舊的，就像貧民窟一樣，都會一一被剷除。也許視覺上很賞心悅目，但整座城市卻也變得越來越同質、單元。

不管由官方，或是由資本所主導的都更，共同的問題乃是，兩者都是「由上而下」，也就是由都市規劃或建築專業者所設計，缺少來自居住者，或是使用者的觀點與參與，因此，大多強調「視覺效果」，「好看」，但「不重用」，不只不利於生活起居，最後也因單元化而逐漸喪失活力，甚至變成珍·雅各(Jane Jacobs)所形容的「單調、死寂」(Jacobs 2007)<sup>1</sup>。偉大城市的衰亡都是這樣發生的。

因此，如果能夠經由社造的途徑，讓都市更新的構想與藍圖，是由在地居民自己來共同討論而成，讓都市設計的目的回到生活本身，讓都市的功能由居住者自己決定，這才是爲人而存在的城市。都市不是要「看」的，是要「用」的。不同階層、族群、或存在狀態的人，都會有不同的需求，每一個街廓或鄰里的更新設計如果能夠反映這些需求，整座城市就會表現出異質與多元的特色，進而建構出一個相互供需、互補互惠的體系。這樣的城市才能永續發展。

## 二、多元城市的意義與價值

珍·雅各在《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》指出，美國主流的都市規

劃，本來的目的乃是要改善工業都市的擁擠，改造惡劣的住宅環境，以營造出整齊、寬闊、舒服的生活環境，但這種規劃的結果，使得美國城市有嚴格的分區使用，工、商、住宅區相互分立。因此，市中心的功能單元化，甚至淪為貧民窟，而郊區則無限擴充，變得單調而死寂。結果反而破壞都市的經濟基礎，造成社會的對立與不安。珍·雅各主張都市要「混合使用」，才能創造都市生活的便利、趣味、多元、與活力。她的論點精彩細膩，可能是20世紀最偉大的都市思想家，值得我們對她的思想進一步闡述。

珍·雅各對城市的主要觀點是，城市是一個生態系統，這個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有同有異。自然生態系統是由「物理－化學－生物」的過程所構成，而城市生態系統則由「物理－經濟－倫理」所構成。儘管構成的元素不太一樣，但確有一個共通的基本原則，也就是兩個系統都需要許多「多樣性」來支持它們。而且，這些多樣性都會隨著時間有機地發展，而不同元素之間也會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依賴。珍·雅各所強調的多樣性，特別重視「小的」、或是「不明顯的」元素，也特別重視「工作類型」，認為這些小的、最不顯眼的「工作類型」，對整個城市生態卻有關鍵性的影響。她這樣說：

生命和生計的多樣性利基(niches)越多，它對生命的負載能力(carrying capacity)就越高。在這兩種生態系統裡面，許多小型的和不明顯的元素——很容易就被忽略或是只被粗略地觀察到——可能對整個生態系統有關鍵性的影響。這和它們的大小或是加總起來的數量相較，根本不成比率。在自然生態裡面，基因庫是基本的寶藏。在城市的生態裡面，工作的種類是基本的寶藏。再者，工作種類不只會在新的增生組織中自我複製，它們還會互相混合，甚至突變成意想不到的新工作。(10)

珍·雅各之所以對小的、不明顯的工作類型特別重視，主要是因為，這些不顯眼的元素，乃是產業鏈的基石，只有這些基石健旺存在，更大、更重要的元素才能生存，這很像自然生態的食物鏈。譬如說，濕地與珊瑚礁存在很多小型的、微型的動植物，是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基石。正因為這些小型動、植物的存在，沿岸的小魚才會前來覓食。小魚來了，更遠處的中魚才會來，最後，遠洋的大魚也會跟著來。因此，有濕地與珊瑚礁的存在，整個食物鏈才能健康繁衍。基礎

的小工作類型看來不顯眼，卻是其他中、大型企業存在的基石。

但是，小的工作類型如何存活呢？或是說，這種工作類型的利基是什麼？珍·雅各對這個問題有很清楚的答案：城市需要舊建築。這裡所謂的舊建築，不是只回復到非常良好和昂貴的狀態的歷史建築，而是其他許多簡單、平凡、廉價的舊建築，包括一些傾頹的舊房子。珍·雅各認為，只有大型企業才付得起新建築的營管費用，而絕大部分的小型企業，只有在老舊的房子才可望存活下來。數以百萬計的一般企業，可以在舊建築中成功地經營，卻被新建築高昂的管銷成本，無情地扼殺了。她說：

許多後來變成城市裡面重要資產的企業，都是從又小又窮的情況起家，最後終於發展到可以負擔得起修復或新建的營運成本。但是，如果沒有對的地方和低收益的空間作為開始的話，這個成長的過程是不會發生的。(219)

其實，很多類型的工作，像藝術工作室、社區酒吧、獨立書店、當舖、樂器行等行業，還會特別偏好舊建築呢！因此，一個城市需要舊建築的混合，才能孵育出多元的企業型態，「豐富的多樣性代表著高收益、中收益、低收益和無收益企業的混合」(211)。舊建築能讓城市多元、有活力。

當然，城市的多元與活力，除了需要新舊建築的混合之外，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的混合，尤其是工、商、住宅的混合，更是關鍵。珍·雅各以紐約哈德遜街為例指出，因為這條街道附近有著各種不同的人群與工作型態，包括實驗室、肉類包裝廠、倉庫工人、加上各種小型製造業、印刷廠、小型工業、辦公室等，還有各類型商店、住宅等，這些不同人群使用街道的時間不一樣，因此，縱使在深夜三點鐘，哈德遜街還是充滿活力，熱鬧非凡，隨時都有各種有趣的「街道芭蕾」上演中。她以下班那個時段為例，記錄下列街景：穿著溜冰鞋、踩著高蹺、騎著三輪腳踏車、玩家家酒、扮牛仔等各種遊戲陸續上演，網綁紙箱、包裝貨品各種動作人群，從雜貨店一路經過水果行延續到肉舖。青少年盛裝打扮，美女從MG跑車下來，救火車叮叮噹噹地經過……。(68)

「熱鬧」是什麼？乃是許多微小人群、景觀、動作的動態組合。

廟會和夜市之所以如此熱鬧，乃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各種人群，士、農、工、商，男、女、老、幼，還有各類型微小的表演、活動、展示等，各種聲音、色彩、味道應有盡有，全部都聚合在這裡，但沒有特別強大或具支配性的東西，每一個人、事、物都是平等的，正是這些特質，讓人在裡面會覺得很自由、甚至很歡樂，又很安全。珍·雅各認為，一個城市的公共治安，並不是由警察來維持的，而是由人們自己近乎無意識所建立的，自發性的干預與規範的網絡來維持，而且是人們自己執行。她認為，這種多元混合，隨時都有很多人在使用的街道，不只是充滿活力、趣味，而且也最安全。

反之，都市規劃所創造出來的城市，最典型的就​​是洛杉磯，市中心都是商業區，入夜後變得冷清。郊區的住宅則無限擴充，城市的範圍甚至超過一百公里，不管工作、休閒、購物等，都必須花上幾十分鐘的車程，不只不環保，而且也很單調死寂，很不安全。珍·雅各的統計資料顯示，洛杉磯是美國最不安全的城市，各種犯罪率都高居第一，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城市嚴格分區，功能單一，街道因此失去多元、活力、與趣味，還必須依靠警察維持治安、建築高牆，而不像那些混居多元的城市，可以由市民自己負起相互監督的任務，自動自發地維持公共治安。

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，都市計畫所創造出來的城市，最大的問題乃是，街道或社區公共生活的消失。在混居多元的城市裡，街道、社區公園、或其他公共設施，對促進城市的公共生活有很大的幫助，珍·雅各這樣描寫：

在這套制度之下，在城市街角附近，有可能認識各式各樣的人，而不會有令人討厭的侵犯，也不會無聊、需要藉口、害怕冒犯，或是有指派和承諾的尷尬，由於彼此關係不深，也不會有各種責任的枷鎖。就一個好的人行道而言，你可能碰到和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人，甚至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你們還會彼此熟識。這種關係可以維持許多年，甚至幾十年。這些關係得以建立，正因為它們是處於人們正常公共出入的途中。(77-78)

在多元、熱鬧的街道、公園、社區生活中，人民之間的接觸、互動是那麼地自然而然而，彼此的關係不見得很緊密，但卻可以持久。

反之，在一個同質單元的街道或社區裡，公共空間往往使用率很低，一定要特別用力，才會真正去使用，不是很自然發生。就像在郊區的社區活動中心，縱使有派對，往往只是私人交往的延伸，很難創造真正的公共性。這種派對也許能夠建立「強連結」，但無法擴大「弱連結」，對公共生活的擴展沒有太大幫助。(Granovetter 1973)

18、19世紀時，美國社區的公共生活很豐富，累積了雄厚的社會資本，也因此成就了美國的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(Tocqueville 2011[1838])。但是，進入20世紀20、30年代之後，美國開始實施都市計畫，都市街道和社區的公共生活大量降低，到了1950年代之後，美國的社會資本開始明顯下滑，帕特南(Robert D. Putnam, 2000)曾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仔細分析，他所提到的因素包括電視、工作、郊區化、世代等。(Putnam 2000)但是，這些因素世界各地都一樣，並無法解釋美國這個獨特而巨大的變化。筆者認為，美國這個獨特的變化，很可能是因為美國土地廣闊，提供了都市規劃有利的條件，造成城鄉結構的巨大轉變，也讓都市街道與社區生活趨於單元化與同質化，進而影響公共生活的內容，可能才是美國社會資本下降的關鍵因素。

### 三、都更的民主化

一個成功的都市鄰里是一個能夠完全跟得上它的問題的地方，所以它不會被這些問題給毀了。一個不成功的都市鄰里是一個被它的缺點和問題掩沒的地方，它在這些缺點和問題面前顯得手足無措。(130)

都市鄰里有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，乃是一個鄰里好壞的重要判準。但是，都市鄰里這種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怎麼養成的呢？過去的都規或都更，基本上都是由官方或是資本，由上而下地執行，鄰里只是依照上頭的指示行事，沒有任何實踐學習的機會，當然會慢慢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。譬如說，為了解決都市的違章、髒亂、醜陋、乃至貧民窟問題，由政府解決的方式，基本上會推出國宅方案，藉此掃除髒亂，整頓市容。這個辦法看來很有效率，但其實產生很多新的問題，除了破壞鄰里原有的社會紋理之外，居民聽命行事，在這個過程中並



沒有學習、成長。有些鄰里本來具有的組織與行動能力，甚至反而因此消失。另一種透過資本的方式，如文林苑，就直接把地上建築物掃除，以一棟大樓來取代，社會資本與民衆能力更會消逝殆盡。

因此，本文主張都市生活要回到市民本身。居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，最好由居民透過社造的形式來解決。政府只是從旁協助，讓居民更有資源來解決問題。我們認為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，居民可以練習組織、開會、協商、溝通、討論等各種民主實作。真正的民主能力，只由在實作中才能慢慢養成，進而培養出解決問題的能力。長期來說，各個鄰里才會變成一個行動體，整個城市才會慢慢恢復活力。如果我們繼續目前都更的做法與方式，我們的市民永遠無法培養出解決問題的能力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政治與資本的力量就更所向披靡，都市轉型的機會就更渺茫了。因此，雖然這個過程緩慢，但卻是讓都市體質得以改變的必經過程。下面，我們將以髒亂、醜舊、低矮為例，討論如何透過社造的形式來進行都市更新。

首先要再次強調的是，城市需要新舊建築的混合，才能孵育出多元性，很多舊房子其實有其特別的意義與價值。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舊房子剷平，不只不智，甚至可惜。本文認為，只要建築結構尚佳，醜舊、低矮的房子仍然可以透過簡單的改造過程，就可以煥然一新，讓整個鄰里的景觀大為不同。這些舊房子可以吸引某類型的產業進駐，讓整個鄰里逐漸恢復活力。下面就以台南市的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為例說明之。

台南市的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，位於台南西區海安路、神農街一代，清朝時期是台南的對外貿易的樞紐，也是五條運河的碼頭總站，過去台南最熱鬧的中正商圈，就是因為五條港的歷史優勢所構成的。後來運河淤積，整個港區逐漸沒落。1990年代初，台南市政府才動起腦筋，想對這各地區進行都市更新，於是在海安路開挖地下街，結果不只破壞整個區域的地景、民宅、也因此加速促成中正商圈的沒落。因此在1998年，才由當地居民、在地社團、學者帶頭成立了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，嘗試對該地區進行社區營造，也在社造的基礎上，引進藝術家，進行都市更新計畫。

這是一個由民間發起、帶動的都更計畫。在進行街道的改造之前，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先進行各種社區營造工程，一方面保留、發揚當地的傳統特色，包括老街、寺廟、碼頭（水文化與健康生活）、飲食文化、特色商店（如青草店、佛具店、中藥店、農具店等），另一方面也配合當地被破壞的地景，引進藝術家進行造街運動。目前海安路和神農街一代，已經成為藝術家的競技場，各種裝置藝術、塗鴉藝術、特色商店，共同構成一條綿延兩三百公尺的藝術大街。原來被拆掉的房屋所剩下的牆壁，經過藝術改裝後已經變成一塊可以設計的畫布，很多過去都更所留下的斷垣殘壁，也因為塗上濃厚的色彩，深藍、大紅、雪白等，不只遮蓋了原來的醜、破、舊的面貌，還讓整個街景變得新潮、時尚。古老的房子變成酒吧、夜店、或其他各種形式的特色商店，一點也不覺得老舊，反而相得益彰。甚至連舊機車、裸露的鋼筋等，都可以變成裝置藝術，增添街道無限的風情。

這是由民間社造所啟動的都市更新，而且是針對一個衰敗、殘破的地區所進行的改造。居民透過一點一滴地塑造、逐漸改變都市的地景與紋路，目前仍在進行中。但是，只有十餘年的光景，「海安路」儼然成為台南的新象徵，為台南建立了新的城市風格。再給個十年、二十年，很有可能因此改變台南的城市命運，甚至變成台灣城市的新典範。本文認為，這個都更案之所以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，最主要的因素是，這裡的居民具有高度的主體意識，幾乎每一戶人家都知道這個鄰里的特色與方向，積極參與其中，對鄰里的未來有一個集體想像，也願意付出實際行動，培養相關的生活文化，藉此一點一滴地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。而這是過去十多年來的社造所慢慢累積而成的。

都市更新過程，當然需要資金的投入。在海安路的例子中，政府的資金幫忙開通海安路，整頓當地的公共空間等，這些協助當然都很重要，是都更不可或缺的一環。很多殘破衰敗的地區，如果有政府資金的介入，可以促成更整體的規劃。但是，要特別注意的是，由國家或資本所提供的資金，往往都是以「氾濫」的方式進入，不管是國宅或是大樓，反而引發相反效果，甚至澇旱成災，對社區造成嚴重衝擊。好的都市建設資金之運用，珍·雅各指出，就像灌溉系統，慢慢

地注入都市鄰里或社區，讓社區穩健、但緩慢地改變。她說：

有穩健基礎的都市建設會產生連續和漸進的改變，產生複雜的多樣性。多樣化的成長本身，是由彼此依賴以建立越來越有效使用組合的改變所創造出來的……這是一個穩定但是漸進的過程。所有在不切實際的幻想過後還能保持活力，還有保存街道的自由和提升市民自我管理的所有都市建設，她的地方必須能夠適應環境、與時俱進、維持有趣、便利，而這些都需要無數逐漸、不間斷的細緻改變。(322)

過去十餘年來，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就是以這種漸進、匯流的方式，慢慢改變海安路的街道性格。這是任何由政府或資本所啟動的「氾濫式」都更無法達成的。正因為是一點一滴地改變，每一棟更新的房子，以及內部所經營的商店類型，都是受到前面的改變所影響，甚至是配合之前的改變、以及附近商店的特色所進行的改裝。真正的「多元性」，乃是在這種相互微調、相互支持、相互配合的過程中產生的。

珍·雅各在討論公園的多元性時，特別指出「複雜度」(intricacy)的重要性。她認為，複雜是和人們到鄰里公園來的各種理由有關。既使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到公園來，也會有不同的目的。有時候只是靜靜坐著，有時候來看打球，有時候來讀書，有時候來賣弄，有時候想要接近一點自然等等。如果公園的「複雜度」不夠，每個地方都和其他地方一樣，每一次使用的感覺都一樣，那麼，人們就沒有必要一再地回到公園了。因此，要創造公園的多元性格，設計時必須注意到「複雜度」，珍·雅各這裡所謂的「複雜度」是指：

我所說的複雜，主要是眼睛視覺上的複雜，地形的起伏，樹叢的聚集、引導到不同焦點的開方空間——簡言之，就是差異的細緻表現，環境的細微差異加上使用的差異，會產生很大的差異。成功的公園在使用時永遠比空蕩時看起來複雜。(121)

鄰里的空間設計，與公園並沒有太大差異。一個鄰里如果要達到多元的理想，一定也要注意「複雜度」，一種差異的細緻表現。只有細緻的差異，可以產生相互支持，相互配合的效果，進而創造更多的交叉與組合，也衍生出不同層次的多元性。差異太大的多元，表面上也是多元，但是，這種多元除了時間使用上還可以相互彌補之外，所能創造的組合就很有限了。

海安路的都更，因為是由下而上，由在地住家主動發起，以分別投入、細水長流的方式進行，因此能夠創造完美的多元體系。在那裡的商店，從酒吧、夜店、茶館、二手書、藝廊、傳統工藝、佛具店、特色家具行、二手百貨、各類型的工作室、健康、飲食、休閒、以及廣泛的生活風格有關的各類型商店，彼此之間有一些類似性，也因此能彼此相互支持，創造集體的吸引力。但是，彼此之間又有細緻的差異，可以相互補足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這些商店構成一個相互依存的食物鏈，一個生態鏈。本文認為，這種多元的生態體系，是無法由上而下創造的。只有讓每個人，每一戶住家都變成主體，從自己的觀點出發，但彼此又分享著相同的集體想像，這樣，才能創造細緻的差異，但相互支持的多元。也就是說，「多元」的基本條件是「民主」。只有民主的都更，才能創造多元的城市。

雖然，多元必須透過民主，才能建立。但是，民主也必須多元參與，才能永續，兩者構成相互循環、相互支持的體系。這裡所謂的「多元參與」是指，參與者之間，彼此共享著一種「相互依存」的結構關係。以都更中的店家為例，如果鄰里中存在著強大的支配者，其個別意見一定會受到特別重視，民主參與的過程會逐漸扭曲，最後，弱勢者會逐漸被迫退出。這種狀況很清楚明白，不必多說。另一種狀況，雖然沒有強大的支配者，但是，所有店家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相互支持或互補之關係，也會陷入各說各話，沒有交集的狀態，這種民主往往變成一種「形式」，很難實質推動任何有意義的方案。但是，在一個真正「多元」的鄰里或城市中，所有店家有一些共同性，可是彼此又有細緻的差異，因此構成相互支持的體系，這樣，每一個店家都是必須被尊重的「個體」，沒有人會被忽略。可是，這些個體又存在著「相互依存」的關係，因此，不能只顧自己，而必須從更整體的角度來看問題。這是最好的民主情境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都更不只是都更。好的都更提供民主社會的地方基礎。如果每個城市的鄰里，都能進行都更，找出鄰里的特色與方向，可是內部卻又呈現細緻的差異，就可以建立多元的鄰里。如果每個鄰里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從城市整體的角度來看，各個鄰里都變成一

個主體，一個不可被忽略的主體，但是，彼此之間也會相互微調，進而讓城市的所有鄰里變成一個相互依存的多元體系，這就是一個民主多元的城市。未來公民社會的建立，要以這種城市為基礎。

#### 四、全球化下的都更：「後－珍·雅各」的想像

本文嘗試從珍·雅各的思想闡明多元城市的價值，也嘗試結合社造與民主的理念，分析民主對建構多元城市的意義。但是，這裡必須指出的是，珍·雅各的思想主要是針對美國而產生的，也就是說，針對美國那種嚴格的都市規劃與分區使用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而發的。可是，這些問題在台灣並不嚴重，我們的城市沒有明顯的分區使用，某一個意義上來看，遠比美國城市更多元、更具活力。這是台灣都市的特質，我們應該繼續保留。只是，目前的都更，基本上是朝往美國都市規劃的方向進行，會讓城市變得同質、單元。這是我們的顧慮所在。當然，台灣城市也有她自己的問題，的確有醜陋、髒亂等問題。但是，如果只是這些問題，背後沒有更嚴重的貧民窟、人口衰退、死寂單調等問題，解決的辦法並不難。本文上面的例子，基本上就是針對這種問題而發的。我們認為，只有透過這種方法的都更，不只能慢慢解決城市髒亂醜陋的問題，還可以保留、甚至創造出更多的活力與多元。

珍·雅各的思想儘管有其地域性。但是，在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下，全球的城市其實經歷了巨大的轉變。本文認為，這個轉變使得珍·雅各的思想變得更具時代性，甚至跨越地域的特殊性，而具有全球的普遍性。我們將在這小節討論這個問題。

大約在1980年代中葉開始，全球化的腳步明顯加速，大型企業進行跨國連結，逐漸形成了「全球競爭體系」，也大大加速了集中化與中心化的進程，對世界造成巨大的衝擊。目前人類所面臨的貧富不均，區域發展不均、地方社會沒落等，都與這個趨勢息息相關，其中尤以全球性的銷售網絡最具破壞性。大型的世界性銷售商，因為集結全世界的消費者向生產者喊價，所以，價格可以拉到最低，也因此對很多本地的企業造成衝擊。以新竹的好市多(Costco)為例，這

個世界性的銷售據點設立後，新竹附近的中小型商家，生意受到很大的影響，從衣服、日用品、到食物等，銷售量大減。而當這些在地商家（三級產業）的銷售量降低時，在地的小型生產者，農業、手工藝業、中小型工廠等，也因為銷售點出了問題，本身的生產也連帶受到影響。不管一、二、三級產業，所有的中小型業者都因為跨國連鎖點的進駐而受到影響。

這還只是銷售端而已。在生產端，生產者為了能夠進入世界性的銷售網絡，彼此之間必須比價。只要貴一些就被淘汰出局。因此，在這種世界性的競爭體系下，所有的生產者都必須嚴格例行降低成本（cost down），很多廠商因此必須從大型化進化的「超大型化」，鴻海在大陸的工廠，動輒十萬人以上。這樣才能把成本降到最低，也因此，中小型廠商生存的空間大受影響。

以上，不管從生產、或是銷售的面向來看，中小企業都面臨很大的困境，這也是目前貧窮、失業、貧富不均的主因。其實，產業鏈就像食物鏈一樣，底層崩解了，就會逐漸往上層連動，很多中階產業或中產階級也因此受到影響。跟本文比較有關的是，在這種集中化與中心化的趨勢下，核心與邊陲逐漸誕生，很多「區域」、「城鎮」、「鄉村」、或「地段」、「鄰里」都受到很大的衝擊，人口外移，產業蕭條、逐漸失去台灣城市過去所有的多元與活力，而逐漸地同質化、單元化，整個區域或地方陷入珍·雅各所謂的貧窮境界。在全球化下，台灣的中南部，除了台中和高雄還好外，幾乎都陷入這種「倒退」的境地，北部地區是核心地帶，比較沒有這個問題，但是，在大賣場的牽制下，縱使台北、新竹這些核心城市，有部分鄰里因為沒有大型賣場、大型百貨公司、或是大遠百的「巨城」系列，街道生活也難免蕭條、凋零。中小型城市雖有連鎖店、或中型賣場進駐，但在地商家的機會卻反而大受影響。

因此，在新的全球化趨勢下，全球的城市正歷經巨大的轉變，台灣的城市也不例外。在這個轉變下，台灣的城市正失去原有的多元與活力，而逐漸地同質化與單元化。也在這個意義下，珍·雅各的都更思想越來越有其時代性。本文認為，在所有核心地區之外的所有其他（邊

陲)地帶，我們應該以鄰里或地方為單位，積極進行都市更新。之所以要以鄰里為單位，主要的原因是，在全球競爭體系下，個別商家完全無法與大賣場競爭，只有透過鄰里的相互支持與合作，構成一個具有細緻差異，但卻享有共同方向的多元系統，一個多樣化的產業組合才可望誕生。這樣，每個鄰里應該可以在自己的特色項目中，有足夠的實力與大賣場相抗衡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國家資源應該適度投入，幫助窮困地區改善硬體工程，含道路設施、公共空間、大眾運輸系統等。但還是要強調，社區自己的主體意識和集體想像與定位，才是最關鍵的。

地區或鄰里的特色應該如何找尋、如何定位呢？為了與大賣場區隔，進而有能力和大賣場、連鎖店競爭，每個地區應該創造屬於自己鄰里的文化特色與價值。很多研究在在顯示，新時代的經濟並不純然是經濟，而往往攙雜多元而細膩的文化內涵，所謂「文化經濟」或是「地方經濟」等都是。（黃應貴 2012）因此，在地產業的建構，也必然是一個文化的建構。像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一樣，透過社造，鄰里的歷史、文化、生態、產業技術、社會條件等，都可以經過細緻咀嚼、再想像與再發明，淬鍊出鄰里的特色，也定位自己的方向。剛開始也許只是一個模糊的大方向，但是，正如我們前面強調的，都更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，只要鄰里的主體意識出來了，每個個別家戶都會慢慢加入都更的過程，用自己的條件找出自己的利基，在集體互動與對話的過程中，創造出很多新的可能性。只是，在宏觀的層次也要特別注意，如何透過各級教育體系，訓練更多、更精彩的人力投入社造，讓社造可以源源不斷地推陳出新，可能也是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地方。

社會文化的建構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只停留在這個層次，仍然欠缺穩固的基礎。如果沒有經濟和產業的重建，縱使改造了空間與鄰里景觀，整個都更仍然只做了一半。如何讓都市硬體景觀的更新，配合經濟和產業的重建，乃是未來都更最最需要思索的方向。尤其在全球化下，產業鏈破碎斷裂、地方鄰里也因此陷入貧窮、衰敗的境地中，珍·雅各關於多元城市的思想，如果能夠好好規劃實踐，應該能為我們指引出前方的道路。

我們上文的討論指出，全球競爭體系下，世界性的銷售網絡不只

扼殺了在地的小型經銷商、小型生產者，也逼得大型的生產者不斷的超大型化，以至於爲了降低成本，不惜犧牲社會、乃至環境成本。當前全球危機的發生，都與這個競爭體系的超結構有關。因此，很多討論「轉型運動」的研究或是實踐案，基本上都圍繞在如何與這個全球性的市場競爭體系周旋的問題之上，大部分的討論都集中在如何重新連結生產與消費，進而讓生產與消費產生循環。這個轉型運動最有名的是英國的「城鎮轉型」，主要是受到普門文化的影響。(Holmgren 2003)

城鎮轉型的討論，繞過社會主義的路線，在資本主義的市場基礎上，討論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，提供新的想像與可能出路，對後續的討論深具啓發性。只是，所有轉型運動的討論，都集中在相對偏遠的城鎮，而對於城市中心，或是所謂的「核心」的轉型問題，基本上沒有處理。但是，轉型不能只是邊陲地區的轉型，而必須把核心地區也納入考慮。因此，真正的轉型必須釐清邊陲與中心，也就是鄉村、城鎮與都市中心之間的關係，也必須釐清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之間的關係，甚至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係。資本主義是一個體系，環環相扣，不能只處理其中一個部門，而必須以更整體的角度來思考。因此，本文嘗試從都更入手，討論如何透過都更促進轉型，讓我們更有能力面對當前的全球危機。

在全球競爭體系下，「產」、「消」、「售」三方是彼此分離的。「轉型運動」嘗試連結「產」、「消」二造，讓二者產生循環，是對資本主義的重大推進。但是，「產」「消」之間的連結固然重要，但並不是很容易進行。以目前的經驗來看，除了食物這個項目之外，其他工業產品的產銷連結則相對困難，甚至很困難。因此，如果能夠在「產」、「消」之外，加入「銷售」的面向，由「鄰里」或是「地方」，透過「銷售」面向來組織、並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，這樣市場體系的問題——「產」、「消」、「售」三者之間的分離，就可以獲得解決。筆者認爲，這是都更未來應該著力的方向。

我們在前面「五條港文化園區」的討論已經指出，一個鄰里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與方向，並在這個方向下，讓這個鄰里擁有多元產業的細緻差異與組合，提供比大賣場更豐富的選擇，這是任何單一個



別中小企業所無法創造的條件，而必須透過鄰里的相互支持與合作，也是全球化時代鄰里或地方的生存利基。但是，除了提供更細緻的多元選擇之外，如何創造一種迥異於大賣場的「社會關係」，讓生產、銷售、消費三者之間的關係，不純然只是市場關係，而是在市場的基礎上，建構出超越市場的可能性，包括產、消、售彼此之間的信任、連帶、乃是承諾等。這種「社會關係」的有無，可能才是未來都更下，鄰里能否建構出新的產、消、售體系，進而協助解決解決全球化下，中小企業逐漸萎縮之問題。

在這個新形式的產銷體系中，未來都更的鄰里必須建構下面四項平台：第一，鄰里內部銷售者平台，這一部份已在上述社造討論過，不再贅述。第二、消費者平台，所有前來鄰里的消費者，其實都有起碼的相似性，應該為這些人建構一個平台。第三、生產者平台，所有提供鄰里產品的廠商，具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性，鄰里也應該建構一個平台，讓生產者之間可以互動。第四、生產、消費、銷售三者之間的平台，讓彼此構成一個相互循環的體系。筆者認為，如果一個鄰里可以建構這些不同層次的產銷平台，鄰里就會變成一個很有創造力的主體，促進產業的重組、創新與轉型，整個產銷結構也會因此起著重大的改變。資本主義的改變，要從鄰里開始。而都更則是讓這個改變成為可能的過程與方法。底下我們分別討論這幾個平台：

（一）鄰里的消費者平台：都更的鄰里，必須知道自己的定位，也必然展現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與方向，各種可能性都有，如歷史、古蹟、運動、健康、休閒、旅遊、飲食（可以細分很多類型）、服飾（也可以細分很多類型）、家具、汽車零件、電器修復、家屋整飾、深度旅遊、樂器大觀、藝術創作、影視器材、3C天地、兒童用品、有機食物等等，都可以建立特色。前來鄰里的消費者，雖然有很大的異質性，但也分享起碼的相似性，可以嘗試進行組織，讓消費者之間可以相互認識、對話。一般市場體制下的消費者，往往只能聽命市場擺布，或是跟著大潮流走，很容易失去判斷力、變成一個純粹的「消費者」，關心的只是價格，或是品質，沒有其他。可是，如果消費者之間有一個民主平台，彼此之間可以對話、討論，很多價格、品質之外

的議題都會一一浮現，甚至倫理性的議題也會慢慢被關注，包括對地球的倫理，對社會的責任等。這些都是在市場邏輯下無法產生的，但透過消費者平台的運作，很多具有批判力的想法就有可能浮現。未來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超越，消費者教育是很核心的環節。

（二）鄰里的生產者平台：近年來社造一個重大的突破是，生產者開始組織，進行社造。這在農業生產方面最明顯，也有了不錯的成果。（李丁讚 2011）工業方面也有令人興奮的進展，彰化「社頭織襪園區」的成立，廠商之間建立一個民主平台，也跟地方社會、包括地方農業密切結合，象徵中小企業也開始在地化與民主化。（李威宜 2013）但是，這仍然是一個特例，剛好織襪產業都集中在社頭，容易集結，進而可以成立協會與平台。但是，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都很分散，也沒有特定的地緣關係，要組織起來其實很難。因此，如果都市鄰里可以扮演組織者的角色，把分散各地的同類型的中小企業組織起來，對中小企業的網絡化與民主化，一定會有很大的推進。一般說來，因為都更鄰里的特色，提供鄰里商家的生產者，其實也享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。這些類似但又有細緻差異的廠商，如果能夠透過鄰里的銷售關係而組織起來，彼此可以對話、分享經驗與技術，對新產品的開發與創新，一定會很有幫助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都更不只是都更，它更是產業重整的方法與路徑。

（三）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平台：以鄰里為運作單位，不只有可以組織消費者與生產者，還可以把生產者與消費者連結起來，建構「生產－消費」平台。根據我們觀察食物網絡的經驗，要直接說服農業生產者進行友善土地的生產，其實很難。但是，如果消費端願意承諾購買生產者的產品，生產者就會根據消費者的需要而生產，包括友善土地、友善消費者的生產方式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改變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，最好的路徑是從消費端進入，進而影響生產端。只是，在目前的市場邏輯運作下，消費者通常以獨立、個別的方式存在，很難組織，更不要說進行消費者教育了。但是，未來的都更如果真的能夠以鄰里為單位，並從社造出發，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組織都變得簡單許多。在這個基礎上，「消費－生產」之間的平台，也比較有可能實現。其實，產銷平台的建構，本來就是所有轉型運動的核心工程。只

是，過去只能在相對偏遠的小鎮進行小規模的實驗，無法對整個城鄉體系進行全面調整。本文所構想的都更，從這個脈絡來看，讓轉型運動的範圍大大擴充，不只可以在鄉鎮進行，也可以在大都會實驗，進行整個體系的調整，對轉型運動具有莫大的啓示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本文基本上是從珍·雅各的多元城市出發，但卻明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主題——農業。珍·雅各的多元思想，完全沒有農業。其實，她對整個自然面向的處理，非常欠缺。她的城市強調集中，甚至不能有太多的公共空間，才可以創造出多元的產業組合。在這個理論脈絡下，農業自然沒有地位。但是，面對全球化的各項危機，尤其在生態、氣候問題上，農業、土地、開放空間的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，縱使在城市裡面，如何讓都市生活涵蓋農業與土地，讓都市的多元性更上層樓，可能是未來城市不能迴避的問題。有學者甚至提出「農業都會主義」(agricultural urbanism)，主張用農業重組我們的都會生活，在在都可以看出，農業在未來人類生活的重要性。(Salle and Holland 2010)因此，本節底下的討論嘗試回應，未來的都更應該怎樣面對農業？筆者認為，這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來討論，一個是城市中心的都更，另一個是郊區的都更。

城市中心的土地本來就比較擁擠，不太可能出現整塊完整的農田。但是，這並不表示，城市中心的居民不可能和農業產生關係，建立城鄉之間的連結。筆者認為，某些市中心的鄰里，仍然可以透過與附近鄉村建立固定的產銷網絡，建立以「農」為特色的銷售網絡，讓整個鄰里擺滿各種新鮮的蔬菜、水果、五穀雜糧、以及各種肉類或奶製品。城市如果有幾個鄰里，是以農為特色，對城市的視覺景觀將會產生一些改變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透過這種城鄉食物網路的建構，這些鄰里可以把它們的「消費者」組織起來，透過各種機會讓他／她們到鄉村去，而鄉村的農夫也可以藉由這個管道到城市來。這對城鄉的交流與互動是很有幫助的。我們強調，食物網絡不只是食物網絡，如何在食物網絡基礎上，建立城鄉之間的社會與文化連結，讓城市人因此開始接觸農業與土地，甚至參與農務的實作，進而學習土地倫理，以及綠色的生活方式。另一方面，鄉下人在這個過程中也會有更多與都

市人互動的機會，會變得比較不土里土氣(less provincial)，這對他／她們的文化資本的增進，具有正面效果。

郊區的都更就不一樣了。郊區很可能還有農地，因此在規劃上，農地可以變成都市農業，讓農夫與住在那裡的中產階級，建立直接的食物產銷網絡，進而促進農夫與中產階級的社會與文化互動。要特別強調的是，這裡的食物網絡比市中心的網絡更在地，基本上屬於同一個社區範圍，因此，產銷之間會有更多的接觸與互動，相互的影響應該也為更大、更直接。筆者在很多郊區都發現，中產階級因為開始使用在地食物，就會開始接觸在地農夫、也會因此慢慢接觸農業與土地，甚至因此開始關心河川、生態等，最後還因此培養出綠色生活方式。一個很細緻、精彩的改變過程，就從在地食物開始。筆者認為，農業和土地是非常有能量的一種行動體(actant)，具有很高的施為能力，任何與它接觸的人與物，很可能就會受到影響。

郊區的農田，除了提供在地的中產階級消費之外，還可以透過都更的整體規劃，設立跟農業有關的飲食、休閒等各種設施，包括各類型的主題餐廳、休閒農場、自然遊樂設施等，讓整個鄉里變成一個綠色生活博物館。還可以透過各種藝文創作，包括攝影、寫生、書寫、記錄片、戲劇、音樂等各種形式，把農業生產過程、人與土地的互動、農產品、飲食文化等，再現農藝，從新把農業與土地的意義與價值，帶回都市人的生活之中。筆者認為，加入農業之後，都市的多樣性與多元化必然大為提升，也會激發出很多新的組合，新的產業型態、新的生活方式。從某個意義來看，把農業從新嵌入都市人的生活脈絡之中，不但沒有抵觸珍·雅各的思想，甚至是對她「多元」理念的闡釋與衍申。

以上我們嘗試說明，未來的都更如何透過中小企業、農業的重組，重新建構產業型態、社會關係與生活價值等。在這整個重建的過程中，「消費者」的組織最為重要。我們前面也稍微提過，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下，每個消費者都是以個別、獨立、甚至對立的方式存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消費者意識只停留在最簡單的價格層次，頂多只會到品質層次，對於跟產品沒有直接相關的社會、文化、生態等面向

的問題，基本上是不會出現的。高階層次的意識，必須在消費者經過組織、互動、對話、討論、論述之後才可望發生。本文所提倡的都更，正好可以扮演這個組織消費者的角色，透過民主互動，讓消費意識慢慢提升，建立超越價格與品質的消費意識，進而對生產者產生影響。筆者從農業的例子一再發現，有意識的消費者，可以對生產者發生建設性的影響。只要消費者肯承諾，生產者就可以用友善土地、友善消費者的方式來生產。我相信，這不只是農業會發生，其他各種日用品或工業產品，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來操作，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就可望在這個過程中改變。

「承諾」是什麼？消費者對生產者的承諾有什麼特定內涵呢？以食物為例，消費者肯用比市場稍微高的價格購買農產品，農夫也答應以新鮮、無毒的農產品回饋，這就是雙方的承諾。這是市場邏輯，但也超越市場邏輯。之所以是「超越」市場邏輯，是因為，消費者不只願意以高於市場的價格來購買，而且，只要雙方立下承諾，縱使農夫因為天災或其他人為的因素，所種出來的農產品品質不如理想，或是欠收，消費者仍然願意承擔風險，讓農夫可以繼續改進。相反地，如果農夫收成特別好，也願意以價格外的方式餽贈消費者。生產與消費兩造，不純粹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待彼此的關係，而是市場之外有一種「社會關係」鑲嵌在彼此之間，讓雙方能夠以更長遠的、關係性的角度相互對待。

但是，筆者要強調的是，只要這是一種民主關係，生產者和消費者兩造之間的承諾，永遠只是暫時的，不可能、也不應該固定下來。農民因為天災而欠收，消費者當然要體諒。農民在有機改作的過程中，往往會種出品質不佳的稻米蔬菜，消費者也要體諒。但是，如果農民老是種出不及格的產品，體諒總是有其限度，承諾也不可能長期維持。換句話說，民主體制下的承諾是脆弱的。但是，正是因為這種「脆弱性」，使得農民必須努力把菜種好，達到一定的品質，才能真正確保承諾，讓承諾永續，農民不會利用、濫用這種承諾。民主，雖然可以創造公共性與相互性，但是，這種公共性和相互性還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，只要對自己的利益冒犯太多、太大，這些公共性與相互

性終究會被擱置。但這正是弔詭所在，也是這種脆弱性，讓民主兩造都必須努力經營彼此的關係，其所創造出來的公共性與相互性也才能永續。這種微妙的辯證關係，辛里希斯(Claire C. Hinrichs)在觀察社區型支持農業時就很細緻地指出來：

社會鑲嵌的過程中，市場或功利的考量仍然不可或缺。這個事實的認識，對於我們瞭解在地食物如何生存與發展的各種可能性，具有關鍵性的後果。假如我們想要農民市集健康地發展，並具有轉型價值，那麼，我們那些關於直接、面對面的情感預設，必須要有保留。社會連帶、私人網絡、以及社區公共財等，總是雜有私人利益的成分，「價格」的考量，也總如影隨形。當然，太多的市場與功利考量，可能沾污交易過程中的相互性，但是，某種程度的功利考量，卻更能確保實質、營養餐飲的存續。(Hinrichs 2000: 301)

## 五、結語

如何面對當前資本主義的諸多困境，進而找出適當的出路，是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共同課題。本文從珍·雅各的都市思想出發，嘗試結合都更與社造，以民主的方式建構多元的城市。筆者強調，都更不只是都市景觀的更新，更是產業的重組。透過都更的社造過程，我們可望建構一個「生產」、「消費」、「銷售」三者合一個平台，透過三造之間的相互承諾，我們可望在市場邏輯的基礎上，建構一個超越市場邏輯的體制，進而為資本主義的出路提出可能性。

過去，人類對資本主義提出各種替代方案，最主要的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。但是，經過過去一個世紀的實踐與實驗，社會主義幾乎宣告徹底失敗。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，它瓦解私有財產，完全忽略個人自私的天性，直接要求每個人為公而活。其實，這是不合乎人性，也不可能永續的。我們上面討論承諾時指出，對相互性的承諾，如果沒有自利的考量，其實是無法永續的。社會主義的失敗正是因為它否定自利的存在。沒有自利的牽制，沒有對承諾的保留，每一種公共性都會被濫用，人性很容易腐敗。民主，因為它一方面從自利出發，但又可以生產公共性，最能維持公、私之間的辯證關係，讓具有公共價

值的制度能夠永續。

筆者過去曾經討論過農業產銷體系的建構。（李丁讚 2011）但是，農業畢竟只是產業的一部分，整個工業、商業產銷體系的建立，對社會轉型的效果可能更是關鍵。因此，本文嘗試透過對當前都更的反思，提出民主都更的設計與方法，希望藉著這個過程，不只可以重新建構我們都市鄰里的社會關係與生活價值，也希望透過這個途徑重組台灣的產業結構，尤其是中小企業。整合兩篇文章，對台灣社會的轉型與重建，應該會有更清晰的方向。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中文書目

Jane Jacobs著，吳鄭重譯注。2007。《偉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：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》(*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*)。台北：聯經。

李丁讚。2011。〈公民農業與社會重建〉，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第八十四期，頁431-464。

李威宜。2013。〈台灣鄉鎮工業區的文化變革：漢人工業社會研究的提問〉，尚未出版。

黃應貴。2012。《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》，《「文明」之路》第三卷。台北：中研院民族所。

### 二、英文書目

Granovetter, M. 1973. "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,"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 78(6): 1360-1380.

Hinriches, Claire C. 2000. "Embeddedness and Local Food Systems: Notes on Two Types of Direct Agricultural Market," *Journal of Rural Studies* 16(3): 295-303.

Holmgren, David. 2003. *Permaculture: Principles and Pathways beyond*

*Sustainability*. Hepburn, Victoria: Holmgren Design Services.

Putnam, Robert D. 2000. *Bowling Alone: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*. New York: Simon & Schuster.

Salle, Janine de la and Mark Holland eds. 2010. *Agricultural Urbanism: Handbook for Building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21st Century Cities*. Canada: Green Frigate Books.

Tocqueville, Alexis de. 2011(1838). *Democracy in America*, translated by Harvey C.

Hinrichs, Claire C. 2000. "Embeddedness and Local Food Systems: Notes on Two Types of Direct Agricultural Market," *Journal of Rural Studies* 16: 295-303.

### 三、報刊資料

漢寶德。2012/05/27。〈建築更新比都更更實在〉，《中國時報》時論廣場。